

知识分子图书馆

Criticism, Canon-Formation, And Prophecy

# 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

[美] 哈罗德·布鲁姆 著

吴琼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知识分子图书馆

# 批评、 正典结构与预言

「美」哈罗德·布鲁姆 著

吴琼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美)布鲁姆著;吴琼译. —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0  
(知识分子图书馆)  
ISBN 7-5004-2867-7

I. 批… II. ①布… ②吴… III. 浪漫主义-研究-文集  
IV. I109.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1089 号

责任编辑 汪民安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李颖明  
版式设计 李 建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125

插 页 2

字 数 271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定 价 19.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知识分子图书馆》编委会

**顾问：**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主编：**王逢振 J. 希利斯·米勒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J. 希利斯·米勒 王 宁 王逢振

白 烨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李自修

刘象愚 汪民安 张旭东 罗 钢

章国锋 谢少波

FT1-120

## 总 序

1986—1987年，我在厄湾加州大学（UC Irvine）从事博士后研究，先后结识了莫瑞·克里格（Murray Krieger）、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沃尔夫冈·伊瑟尔（Walfgang Iser）、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后来应老朋友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之邀赴杜克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在他的安排下又结识了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费兰克·伦屈夏（Frank Lentricchia）和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 Said）等人。这期间因编选《最新西方文论选》的需要，与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及其他一些学者也有过通信往来。通过与他们交流和阅读他们的作品，我发现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各有所长，他们的理论思想和批评建构各有特色，因此便萌发了编译一批当代批评理论家的“自选集”的想法。1988年5月，J. 希利斯·米勒来华参加学术会议，我向他谈了自己的想法和计划。他说“这是一个绝好的计划”，并表示将全力给予支持。考虑到编选的难度以及与某些作者联系的问题，我请他与我合作来完成这项计划。于是我们商定了一个方案：我们先选定十位批评理论家，由我起草一份编译计划，然后由米勒与作者联系，请他们每人自选能够反映其思想发展或基本理论观点的文章约50万至60万字，由我再从中选出约25万至30万字的文章，负责组织翻译，在中国出版。但1989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套书

的计划被搁置下来。1993年，米勒再次来华，我们商定，不论多么困难，也要将这一翻译项目继续下去（此时又增加了版权问题，米勒担保他可以解决）。作为第一辑，我们当时选定了十位批评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保罗·德曼（Paul de Man）、德里达、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伊瑟尔、费什、詹姆逊、克里格、米勒和赛义德等。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决定独家出版这套书，并于1996年签了正式出版合同，大大促进了工作的进展。

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批评理论家的作品翻译出版呢？首先，他们都是在当代文坛上活跃的批评理论家，在国内外有相当大的影响。保罗·德曼虽已逝世，但其影响仍在，而且其最后一部作品于去年刚刚出版。其次，这些批评理论家分别代表了当代批评理论界的不同流派或不同方面，例如克里格代表芝加哥学派或新形式主义，德里达代表解构主义，费什代表读者反应批评或实用批评，赛义德代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德曼代表修辞批评，伊瑟尔代表接受美学，米勒代表美国解构主义，詹姆逊代表美国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伊格尔顿代表英国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研究。当然，这十位批评理论家并不能反映当代思想的全貌。因此，我们正在商定下一批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名单，打算将这套书长期出版下去，而且，书籍的自选集形式也可能会灵活变通。

从总体上说，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的论著都属于“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范畴。那么什么是批评理论呢？虽然这对专业工作者已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但我觉得仍应该略加说明。实际上，批评理论是60年代以来一直在西方流行的一个概念。简单说，它是关于批评的理论。通常所说的批评注重的是文本的具体特征和具体价值，它可能涉及到哲学的思考，但仍然不会脱离文本价值的整体观念，包括文学文本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而批评理

论则不同，它关注的是文本本身的性质，文本与作者的关系，文本与读者的关系以及读者的作用，文本与现实的关系，语言的作用和地位，等等。换句话说，它关注的是批评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方式，批评本身的特征和价值。由于批评可以涉及到多种学科和多种文本，所以批评理论不限于文学，而是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它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有这样那样的联系，甚至有某些共同的问题，但它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大而化之，可以说批评理论的对象是关于社会文本批评的理论，涉及到文学、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建筑学、影视、绘画，等等。

批评理论的产生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60年代以来，西方进入了所谓的后期资本主义，又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跨国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之后的时期或后现代时期。知识分子在经历了60年代的动荡、追求和幻灭之后，对社会采取批判的审视态度。他们发现，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文学艺术，出现了种种充满矛盾和悖论的现象，例如跨国公司的兴起，大众文化的流行，公民社会的衰微，消费意识的蔓延，信息爆炸，传统断裂，个人主体性的丧失，电脑空间和视觉形象的扩展，等等。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充满了焦虑，试图对种种矛盾进行解释。他们重新考察现时与过去或现代时期的关系，力求找到可行的、合理的方案。由于社会的一切运作（如政治、经济、法律、文学艺术等）都离不开话语和话语形成的文本，所以便出现了大量以话语和文本为客体的批评及批评理论。这种批评理论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大学文科教育的性质，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辨析问题的能力。正因为如此，批评理论一直在西方盛行不衰。

我们知道，个人的知识涵养如何，可以表现出他的文化水平。同样，一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如何，可以通过构成它的个人的知识能力来窥知。经济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意味着文化水平会同步提高。个人文化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阅读的

习惯和质量以及认识问题的能力。阅读习惯也许是现在许多人面临的一个问题。传统的阅读方式固然重要，但若不引入新的阅读方式、改变旧的阅读习惯，恐怕就很难提高阅读的质量。其实，阅读方式也是内容，是认知能力的一个方面。譬如一谈到批评理论，有些人就以传统的批评方式来抵制，说这些理论脱离实际，脱离具体的文学作品。他们认为，批评理论不仅应该提供分析作品的方式方法，而且应该提供分析的具体范例。显然，这是以传统的观念来看待当前的批评理论，或者说将批评理论与通常所说的文学批评或理论混同了起来。其实，批评理论并没有脱离实际，更没有脱离文本；它注重的是社会和文化实际，分析的是社会文本和批评本身的文本。所谓脱离实际或脱离作品只不过是脱离了传统的文学经典文本而已，而且也并非所有的批评理论都是如此，例如詹姆斯那部被认为最难懂的《政治无意识》，就是通过分析福楼拜、普鲁斯特、康拉德、吉辛等作家作品来提出他的批评理论的。因此，我们阅读批评理论时，必须改变传统的阅读习惯，必须将它作为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来理解其思辨的意义。

要提高认识问题的能力，首先要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这就需要像经济建设那样，采取一种对外开放、吸收先进成果的态度。对于引进批评理论，还应该有一种辩证的认识。因为任何一种文化，若不与其他文化发生联系，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存在。正如一个人，若无他人，这个人便不会形成存在；若不将个人置于与其他人的关系当中，就不可能产生自我。同理，若不将一国文化置于与世界其他文化关系之中，也就谈不上该国本身的民族文化。然而，只要与其他文化发生关系，影响就是双向性的；这种关系是一种张力关系，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一切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联系；只有不断吸收外来的新鲜东西，才能不断激发自己的生机。正如近亲结婚一代不如一代，优种杂交产生新的优良品种，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应该互相引进、互相借鉴。我



们无需担忧西方批评理论的种种缺陷及其负面影响，因为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已经变成了无意识的构成，这种内在化了的传统因素，足以形成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在吸收、借鉴外国文化（包括批评理论）中形成自己的立足点。

今天，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内在作用或市场经济和资本的运作，正影响着世界经济的秩序和文化的构成。面对这种形势，批评理论越来越多地采取批判姿态，有些甚至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一些保守的传统主义者抱怨文学研究被降低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对文本的分析过于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然而，正是这种批判态度，有助于我们认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逻辑，使我们能够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更好地思考自己相应的文化策略。应该说，这也是我们编译这套丛书的目的之一。

在这套丛书的编选翻译过程中，首先要感谢出版社领导对出版的保证；同时要感谢翻译者和出版社编辑们（如白桦、汪民安等）的通力合作；另外更要感谢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热情鼓励和支持。这些学者们认为，这套丛书必将受到读者的欢迎，因为由作者本人或其代理人选择的有关文章具有权威性，提供原著的译文比介绍性文章更能反映原作的原汁原味，目前国内非常需要这类新的批评理论著作，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无疑会对这套丛书的质量提供可靠的保障。这些鼓励无疑为我们完成丛书带来了巨大力量。我们将力求把一套高价值、高质量的批评理论丛书奉献给读者，同时也期望广大读者及专家学者热情地提出建议和批评，以便我们在以后的编选、翻译和出版中不断改进。

王逢振

1997.10. 于北京

## 译者序

20 世纪 50、60 年代美国的文学批评是形式主义独领风骚的年代，但 60 年代后期，德里达的解构哲学的登陆，新左派批评的崛起，欧陆辩证思维传统的引进，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等等，在北美思想界和批评界掀起了一股反经验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浪潮，耶鲁大学就是其中的重镇，杰弗里·哈特曼、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以及哈罗德·布鲁姆组成的所谓“耶鲁四人帮”更是以其隐晦曲折的文风、独辟蹊径的阅读技巧、风格多样的阐释模式和犀利尖刻的批评语言把循规蹈矩且学院气十足的形式主义批评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使得后者从此变得一蹶不振。在这四个人当中，哈特曼和米勒已被本丛书收编在册，现在的这本文集则是布鲁姆的一个自选集。其中收录的十四篇论文虽然分别选自布鲁姆的七部著作，但它们基本上都能够独立成篇，且大体反映了布鲁姆的批评风格和理论特色。下面，我们针对这些作品简单地谈一下布鲁姆文学批评的几个方面。

哈罗德·布鲁姆，1930 年出生于纽约，曾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其主要著作有：《雪莱的神话创造》（1959 年）、《幻想的伴侣》（1961 年）、《布莱克的启示》（1963 年）、《叶芝》（1970 年）、《塔中鸣钟者：浪漫主义传统研究》（1971 年）、《影响的焦虑》（1973 年）、《喀巴拉与批评》（1975 年）、《误读地图》（1975 年）、《诗歌与压抑》（1976 年）、《具有想

象力的比喻》(1976年)、《华莱士·史蒂文斯：我们气候的诗》(1977年)、《逃向魔鬼：诺斯替主义的幻想》(1979年)、《对抗：走向一种修正理论》(1982年)、《正典的强光》(1987年)、《影响诗学》(1988年)、《神启真理的毁灭》(1989年)、《美国宗教》(1992年)、《西方正典》(1993年)、《千禧年的预兆：诺斯替主义的天使、梦和复活》(1996年)等。

布鲁姆作为一个批评家其研究主要包括诗歌批评、理论批评和宗教批评三大方面，而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后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犹太教的诺斯替主义与喀巴拉主义则是这些批评的主要对象。显然，布鲁姆的批评观是一种大批评观，即首先，他打破了传统的把创作、批评和理论截然剥离的学科分划，强调三者之间的相互渗透，在他眼里，莎士比亚是弗洛伊德之前的弗洛伊德主义者，弗洛伊德则是莎士比亚之后的强力诗人，他们的诗歌话语或理论话语都突显了西方现代文化中有关创造性的崇高理念，他们都是强力的诗人和理论家。其次，他的大批评观念还表现在把人类的几乎所有文化行为或活动都看作是可供阅读的文本，因此在他的批评中，理论文本（例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宗教文本（例如圣经或摩门教的教义）也都被当作想象性的文本看待，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以各种各样的隐喻和修辞表现出了创作者特殊的心理经验（例如防御与压抑、强力误读与影响的焦虑），而批评就是以另一些隐喻或修辞对文本进行解神秘化的活动。我们可以看到，布鲁姆的大批评观念其实是文学批评或文本批评的一种泛化，在他那里，人类文化的一切活动同时都是一种文本活动，都可以在文本——不论是文学文本，还是批评文本或理论文本——中找到其心理活动尤其是防御与压抑活动的机制。

由于与耶鲁学派的关系，一般地，人们把布鲁姆也称作是美国解构批评的代表人，并认为这一批评与德里达掀起的解构运动

有关。但是，正如德里达本人一再强调的，把他的解构哲学和美国的解构批评联系在一起只是一种“专家的变形”，是学院派的专家们出于自身特殊的需要和要求把解构嫁接到文学批评活动上的结果。实际上，美国的解构批评是在一个十分特殊的文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是美国历史、宗教和文学活动的产物，尤其是它与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复杂关系最能体现出其对50、60年代流行的新批评与形式主义的反拨。我们看到，“解构”在美国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来加以运用的，而这正是德里达所难以认同的，因为在德里达那里，解构运作的目的主要在于颠覆、瓦解传统的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之上的一切等级模式和语言结构，他之所以强调文本的重要性，是因为他认为在文本的边缘处，总是隐含有二元对立中受压抑的一方的符号踪迹，正是它们构成了瓦解处于中心的一方乃至整个二元系统的力量。而在美国的解构批评中，德里达的这一解构策略被正典化为一种互文性理论，一种通过揭示文本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文本自身内部的意义的异质性和混杂性来解放文本的方法。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说，美国批评家对德里达的解构理论的这一挪移或误读的确对批评活动具有巨大的激活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克服德里达哲学中的虚无主义倾向。

其实，对于美国的批评家而言，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似乎还不是德里达本人所意识到的那种区别，即他的解构哲学与美国的解构批评之间的区别，而是隐含在这一区别背后的那一真正的联系，那种父子之间的承继关系，所以，对于他们这些解构理论的“新人”或迟来者，以文本主义的方式来误读和修正德里达既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或者说既是对德里达或德里达的影响的认同，也是对这一影响和认同的反抗。这也就是布鲁姆所讲的“影响的焦虑”：“新人”或迟来者对待前驱的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不过，这种影响的焦虑以及为此而作的修正和反抗在有些人那里是无意识的，而在另一些人那里则是清醒地意识到的。布鲁姆就是

后一种人的代表。他曾经说：“我发现下面两种人之间其实并无任何实质性的区别，一种是那些陈腐过时的、不结果实的学院派，他们只是高呼一些观念和意义的口号，一种是正在壮大的文本主义者，他们只知死搬那些新的教条，如唯有文本存在；文本之外别无他物；文本，或要成为文本，必须悬置其指涉的各个方面，等等。同样，我在下面两种人之间也看不到任何实质性的区别，一种是传统主义者，他们坚持认为一切文学影响都是有益的，一种是解构主义者，他们断言所有的文本都与文学影响无关，文本的存在是偶然的、非连续性的事件，就像所有人的死一样。至于我自己的观点，在解构主义者看来是传统主义的，而在传统主义者看来又是解构主义的，这种双重性无疑增添了其在批评中的魅力。”在此我们看到了布鲁姆把美国的文本主义和德里达的解构运作混为一谈的策略，即他想借此来抵御那影响的焦虑。

其实，影响的焦虑正是徘徊在布鲁姆的批评中的一种基本情结，这也许与美国文化本身除土生土长的实用主义之外大都受到了外部文化的影响这一特性有关，但是，影响的焦虑并不只具有消极的意义，恰恰相反，在他看来，在影响之中寻求创新，在前驱的压抑之中激发出创造的意志，这正是美国文化尤其是宗教和文学所具有的本土性。例如本文选第一部分的三篇文章就是有关美国摩门教的。摩门教（又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是19世纪30年代由美国人约瑟夫·史密斯创立的一个基督教派别，因信奉《摩门经》而得名。此教在基督教多数派眼里具有异端的性质，但布鲁姆在此无意卷入宗教的正统与异端之争，而是着力于分析摩门教创始人史密斯的宗教创造力和想象力，分析摩门教的基本精神之于美国未来社会的重要意义。在布鲁姆看来，摩门教是一种最为典型的美国宗教，其对基督教传统的大胆背离、对圣经的强力重读以及它所宣扬的众多不为正统所容的教义，尤其是它对上帝的解释和它的一夫多妻制的主张等等，都显示了其创立者史密

斯及其后继者的一种堪与爱默生、惠特曼等相媲美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布鲁姆本人并不是摩门教徒，他信奉的是犹太教的神秘主义，他对摩门教所作的宗教批评表明了他的批评的包容性。

但是，布鲁姆主要地还是一位文学批评家。与耶鲁学派的其他批评家一样，布鲁姆主要的批评对象也是欧洲浪漫主义，本文集中的《追寻罗曼司的内在化》一文是他在这方面的力作，在这篇论文中，他对英国19世纪初期的浪漫主义诗歌进行了总体的描述。他认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乃是从欧洲传统的文学形式即追寻罗曼司演变而来，或者说，传统的向外部世界的追寻在此转向了对内心世界的探求：“追寻罗曼司的运动在被高级浪漫主义内在化之前，是从自然走向救赎的自然，救赎的力量是某种外部的精神权威，有时常常是超自然的精神权威的馈赠。浪漫主义的运动则是从自然走向想象力的自由（有时常常是一种难以驾驭的自由），而且这种想象力的自由在方向上常常还是对社会自我的净化和救赎，但同时也是对它的破坏。浪漫主义内在化或者说在一个新生的人自身之内发现天堂所需的高昂代价，就是要在自我意识的范围内表现自身。追寻就是要在强化意识的同时扩展意识，但一种要把意识限制在严重的自我陶醉中的精神倾向又会掩盖追寻。”他指出，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那里，罗曼司的内在化追求经历了三个阶段：普罗米修斯阶段、炼狱阶段以及最后的“真实的人或想象”的阶段。在普罗米修斯阶段，诗人或者说英雄诗人的特征就是热衷于政治、社会和文学革命，而且会直接投身于此类革命；然而，这个阶段由于诗人过分的自我中心的膨胀，最后必然会走向瓦解，随之而来的就是诗人充满危机的炼狱阶段，在这一阶段，诗歌和诗人的自我都受到严峻的拷问，对自我的逼问而导致的心理矛盾最后在想象的阶段通过“爱的辩证法”得以解决，自我的利比多与能动的想象在爱的追寻中被整个地融合在一起。但是，在论文的结尾，布鲁姆似乎对这种爱的辩证法能否最终解

决自我的心理矛盾仍持怀疑态度，他以雄辩的语气说道：“作为浪漫主义的整个追寻目标的爱可能是任何别的什么东西，但它不可能是一种疗法。它必定能使一切得以更新，然后与它所创造的东西结合。它很少紧迫地寻求通过每个人的创造潜能的相似物来规定自身。但是它能通过它的诗人认识到，它不能规定自己是什么，而只能规定自己将是什么。浪漫主义者所预言的人是一种核心人物，他总是处在成为自己的父亲的过程中，并且，尽管他的主要诗作可能已经写成，但他还没有赋予其预言以血肉，也没有对他的爱的终极形式给出证明。”这一具有开放姿态的结尾表明，布鲁姆其实是把罗曼司的追寻视作是人类永恒的渴望，是人类用来对抗这个均质的世界的最后手段，正如他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对于没有任何信仰甚至不轻易相信任何东西的人来说，罗曼司的精神形式究竟是什么？在一个简约的死寂的世界里，或者说在一个意义分裂、每一个都与另一个相分离的孤立王国内，诗人（或者说任何人）的生命如何才能是一个不断延续的寓言呢（济慈认为莎士比亚的生命就是如此）？虽然所有的人都是追寻者，或者说至少是这样，可在一个只求延续的灰色世界、一个均质的世界里，哪里还谈得上追寻？或者用华滋华斯自己的话说——可以把它用在每个重要的浪漫主义诗人身上——还有哪种知识不是以丧失权力为代价才能获得？”

布鲁姆作为一个批评家最为人知的方面就是他的“影响的焦虑”理论。在70年代的那部激情洋溢的著作《影响的焦虑》中，他将弗洛伊德的弑父情结、尼采的强力意志和保罗·德·曼的误读理论融在一起，提出所有作为后来者的强力诗人面对前代巨擎只有通过各种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误读”方式——如修正、贬抑或否定传统——来成就自己，确立自己作为诗人的形象，这种既要超越前驱但又时刻生活在前驱的阴影之中的互文性运动造成了所谓的“影响焦虑”。通过这一理论，布鲁姆得出了两个重要的结

论：第一，一部诗歌的历史，尤其是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诗歌史，就是一部误读、曲解和修正的历史，也是一部压抑与反压抑、焦虑与反焦虑的历史；第二，影响或修正意味着，根本不存在文本，而只存在文本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又取决于一种批评行为，即取决于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的误读或误解，实际上，不仅写作是一种误读行为，而且所有的阅读和批评也是一种误读。因此，所谓的文学批评，其实就是要通过揭示文本间的复杂关系来显示诗人之间的关系，来追述文本之间的相互影响。他把这种批评称之为是一种逆反批评或一种“修正主义”的理论。表面上看，这些理论的局部或“碎片”形态确实洋溢着解构批评的某些踪迹，但他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解构主义者，正如他自己一再强调的，他是一个美国式的批评家，他的身上浸透着美国文化的精神，这就是实用主义，这种精神渗透在美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哲学、宗教和文学中，因此在他的批评话语中，他所要提问的不是文学或批评是什么，而是文学或批评对我具有什么样的功能，我能从文学或批评中得到什么，等等。而隐藏在这些问题背后的主题词，仍然是他一直要揭示的创新的强力意志，所以，在他的批评中，反抗、创新、力量、崇高等才是真正内在的中心，是他的追寻罗曼司的最后寓言。

在布鲁姆的批评理论中，我们看到，弗洛伊德犹如一个幽灵一样在他的文本中四处出没。布鲁姆在论及弗洛伊德时说，莎士比亚之于弗洛伊德，就犹如维吉尔之于但丁，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弗洛伊德之于布鲁姆，就犹如莎士比亚之于弗洛伊德，弗洛伊德乃是他精神上的父亲，是他的遮护天使。那么，面对这位“强力诗人”，布鲁姆感受到了自己所说的那种影响的焦虑吗？在《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事实性的悲哀》一文中，他称弗洛伊德构成了当代西方文化的“事实性”，即一种不可避免的存在，它是对我们的一种限制、压抑或否定，它把我们囚禁在它的由各种隐



喻所构成的堡垒之中。而在《对抗：修正理论与批评的个性》、《弗洛伊德与崇高：创造性的灾难理论》和《弗洛伊德的防御概念与诗人意志》等文中，布鲁姆通过对弗洛伊德晚期的理论文本，尤其是《超越快乐原则》、《自我与本我》等作修正的阅读，表明了自己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批评模式的认同，但同时也揭示了弗洛伊德作为一个强力批评家自我修正的焦虑，以及这一自我修正行为对于批评，尤其是个性化批评的重要意义。那么，如果如布鲁姆所说，一种真正的强力批评首先必须自身就是一种强力误读，且必须允许别人也对其作强力的误读，那么，他从弗洛伊德那里到底读到了什么，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弗洛伊德的文本能给予他什么？还有，我们又能从他那里读到什么？如果我们看一下布鲁姆的著作，就能发现，在他的文本中四处弥漫的是这样一些意象：压抑、崇高、创造、渴望、毁灭等，这就是他的追寻罗曼司的主题，是他用来阅读他人如弗洛伊德的基本语码，也是他用来修正或置换他人的基本工具。在《弗洛伊德：一种莎士比亚式的阅读》一文中，布鲁姆以逆反批评的方式读出了弗洛伊德作为一个强力的诗人和强力批评家置身于莎士比亚的文本之中时的影响焦虑，在这里，他发现，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其实是一种哈姆雷特情结，前者作为一种修辞或隐喻的表述其实是弗洛伊德用来压抑或否定莎士比亚对自己的影响的策略。依照这样一个逆反的逻辑，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以《布鲁姆：一种弗洛伊德式的阅读》为题来对布鲁姆施以同样的逆反策略呢？从理论上说，这当然是可能的，因为他对所有迟来者的诗人的创造作的俄狄浦斯式的阅读恰恰是他内心的影响焦虑的见证，而他把撒旦式的魔鬼化原则作为迟来者对抗前人的不二法门也只是从相反的方面在强化这种焦虑。